

兩岸四地館藏抗戰時期 澳門史料的探索與評析

吳樹榮*

抗戰期間澳門未被日軍佔領，其原因一直為中外史學界着謎。各方人士均可在“中立”的澳門活動，理應留可不少紀錄。本文嘗試追尋兩岸四地的檔案館和圖書館所藏有關的澳門史料，為有志研究澳門抗戰時期歷史的人士，提供追蹤的線索。

由於史料的特性可分文字和非文字兩大類，故本文除了談及文字史料外，還指出保護非文字史料的文物史料和口述史料的重要性，以期有志人士共同保護澳門歷史的珍貴資產。

引言

抗日戰爭期間澳門未被日軍佔領的原因，一直都是中外史學界着謎的課題。澳門葡萄牙政府秉持的所謂“中立”政策，一向都被作為解釋這一課題的原因之一。可是，這樣的說法卻無法完滿解釋一系列的事件，如日軍祇因葡萄牙的“中立”政策，或害怕巴西日本僑民被遣返而不佔領澳門，那為甚麼又佔領了葡萄牙殖民地帝汶呢？學術界卻不相信這種解釋，不斷探索背後的原因。

姑勿論澳葡所謂“中立”政策是否真正的答案，澳門未被日本佔領卻是不爭的事實。正因如此，澳門應保存了比其它地方更多的紀錄，作為研究這段史實的根據。對戰時的種種疑問，學者們都未能在現有文獻中找到答案，甚至無法找到線索。為甚麼呢？可能是現存的文獻並沒有完整的紀錄，研究人員根本無法瞭解當年澳門發生過的事。這又是為甚麼呢？

另外，戰時澳門曾有超過四十萬人居住，見證澳門在這期間的種種事件。然而勝利凱歌高奏之時，也就是難民返回原居地的時候，戰後二十七萬人離開，也帶走了很多見證歷史的人物，重塑史實，更加困難。

現在已出版有關抗戰時期（1931-1945）澳門的作品，大都是零碎而不完整、片面而不成系統的。要更好瞭解這段歷史，除了需要認識已知的史實外，也要帶着好奇、疑問和想像。因為現存的文獻難以重構完整的歷史面貌，研究必須以好奇的心去問，用想像和思維去找史料；祇有找到更多史料，才可以進一步排整史料和重構史實，也才能在這一基礎上，解答一系列未解的歷史之謎。

澳門在抗戰時期的獨特性與文獻保存

戰時澳門“中立”未被佔領，除在戰爭後期

* 吳樹榮，澳門大學歷史系兼任講師、廣州暨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博士研究生、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課程碩士；曾任香港浸會大學青年研究實踐中心高級研究助理，參與澳門青年偏差行為服務研究，研究興趣包括抗戰時期澳門、香港及華南的歷史、民國史、近現代經濟史及省港澳在這些時期的關係，亦涉及澳門青年和教育問題的研究。

被美軍空襲戰略設施三次外，其它時間都未經戰火波及。在這種環境下，官方和民間的圖書報刊文件等都未經破壞，應該保存完整。任何背景的人員都可在澳門活動，這使涉戰各方都或多或少在澳門從事有利於自己的工作，因而可能留下紀錄，反映各自的行動、澳門的社會民情、以及其他力量在澳門活動的情況，或會成為檔案保存下來。因此，評估在澳門活動的勢力，就可能找到相關的史料。

戰時在澳門活動的力量，除管治澳門的葡萄牙人外，還有執政中國的國民黨、擁有武裝力量的中國共產黨、汪精衛偽南京政權或偽國民黨，以及日本和英國的外交和情報組織，因此它們也應保存着相當部分有關澳門的檔案。多國都保存這些文獻史料，形成了史料的多面性特點，多種比對成為研究這一時期歷史的重要方式。中葡英日等文字的史料，跟中國近現代史的史料有共同的特點——多面性，而且散佈在全球各地。

就目前所知，這一時期的檔案分佈在澳門、葡萄牙、香港、臺灣、大陸、英國、美國、澳大利亞、荷蘭、法國和日本等地，這也是戰時澳門史料具有多面性的特點，也說明澳門抗戰時期歷史的複雜性和研究的困難。

相關史料文獻的種類和蒐集

一、史料的種類和整理

史料是重構歷史事實的基礎，祇有通過蒐集和整理這一時期的史料，才可展示史實和解答各種疑問。所謂史料，根據德國史學家伯倫漢（又譯班漢穆，Ernst Bernheim）的定義，是“史學所用以獲得其知識的材料”，臺灣學者傅斯年也說“史學便是史料學”。掌握史料，便可以通過對史料的整理，重構史實。

伯倫漢將史料分為三種形式：口述史料、文字史料和文物史料。屬非文字史料的口述和文物史料可在澳門本土，又可於其它地方得到；是否容易找到，又可能視機緣而定。文字史料種類繁

多，前輩的整理和努力，部分已見諸出版物。本文所談以文字史料為主，兼談非文字史料。訪問史料和電子資料也可歸類為口述和文字史料，也將一併談及。

文字史料就是用文字記載、具體認識歷史的材料。根據應用的程度，可以分為原始史料（或直接史料，Primary sources）或二手史料（或間接史料，Secondary sources）兩種。原始史料是未經使用的資料，如檔案、書信、日記、調查報告、會議紀錄、個人回憶錄或事後追記的文字或見聞等等。二手史料是非原本的史料，經轉手如“由口頭傳說而記載的材料”，“凡由後人編纂的史書”或“做製品與改造品”都可視為二手史料⁽¹⁾。

二、抗戰時期史料的蒐集

學術界早在1994年就開始重視澳門史料的整理，不少學者於該年在澳門舉行的“首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出整理澳門史料是經驗和看法，以及介紹各地有關澳門的史料的收藏情況。可是，與會學者大多講述澳門開埠至民初期間的史料，未提及也未探索抗戰時期澳門史料的特點、種類和分佈，更沒有人指出可能的研究方向。其後楊開荊的博士研究，和以其博士論文為基礎出版的《澳門特色文獻資源研究》，亦未探討抗戰時期的史料。這使研究這一時間的歷史，欠缺可作參考的線索。

清季民初有關澳門的史料，中國內地、臺灣和澳門都有出版。如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澳門專檔》，黃鴻釗編《中葡澳門交涉史料》，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大學、澳門理工學院合編的《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中葡關係卷》等等，趙春晨的〈澳門歷史研究與新史料的刊佈和利用〉（《學術研究》，2003年第6期）對這些文獻已有較詳細的介紹，這裡不贅。

目前已出版的有關抗戰時期澳門的史料，祇有傅玉蘭主編、澳門文化局及澳門博物館共同出版《抗戰時期的澳門》，以及蔡珮玲主編的《口

述歷史：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陳樹榮以濠江客為筆名發表的〈圖說澳門〉，以他個人蒐集到的文字或文物史料而撰寫的大量文章，發表於《澳門日報》。這些出版的文獻都可作為線索，研究這一時期澳門的歷史。另外，部分已發表的論文所引用的檔案等材料，也可作為研究的史料，如金國平、吳志良〈抗戰時期澳門未淪陷之謎〉就被大量使用。

紀錄澳門情況的文獻，除有官方葡文材料和本地華人的文獻外，還有在澳活動的外籍人士的紀錄、個人日記或事後回憶等文獻。根據目前所了解的戰時澳門，澳葡政府的官方文件，是首要研究的史料。此外，當時國民政府以及執政中國國民黨系統，都在澳門派有官方人員，中統和軍統都有機構在澳門活動，他們的文件和檔案也是研究不可缺少的文獻。外交文件或情報雖然會涉及事件的真實性，但也反應當時某一方所得所知的情况，當局根據消息所作的反應，也還是歷史的一部份，所以這些史料亦有一定的價值。

戰時中國共產黨在澳門派駐地下人員，如醫生柯麟的各種工作的概略，已是眾所周知的事。日本在澳門設在領事館和情報機關，戰後亦有檔案留存，房建昌所寫的〈從日本駐澳門總領事館檔案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寇在澳門的活動〉（《廣東社會科學》，1999年103期）指原日本駐澳門領事館的檔案，戰後送到北京圖書館收藏，其它日方檔案還有多少涉及澳門，還須懂得日文的學者努力。汪偽南京政權及偽國民黨同樣在澳門活動，都應留有檔案文件，祇是不知是否還有留存。另外，英國駐澳門領事和英國人在澳門的活動，一直未有華人學者探索，英國駐澳門領事的檔案應在英國，仍有待開發。

兩岸四地文獻史料的特點

一、報章史料

報章消失，歷史成空白

報章是重要的史料。澳門報業的發展，可追

溯至鴉片戰爭以前，林玉鳳已在其博士論文《鴉片戰爭前的澳門新聞出版事業》作出研究。事實上，30代的澳門曾出現多種報章，如《新聲日報》（1930年創刊）、《澳門時報》（1931年創刊）、《朝陽日報》（1932年11月創刊）、《大眾報》（1933年7月15日創刊）、1937年11月20日創辦的《華僑報》，《市民日報》（1944年創辦）。此外，太平洋戰爭期間汪偽也在澳門成立《西南日報》和《民報》。

30年代創辦的中文報章，勝利後祇剩下《大眾報》和《華僑報》，其餘的都在戰時結束。奇怪的是，這些報紙目前已無法在檔案館或圖書館找到，究竟30代澳門的報紙為甚麼消失了呢？這也是一個謎。

抗戰時期澳門的報章史料，目前祇有由湖北省圖書館攝製的《大眾報》、《華僑報》、《市民日報》和《西南日報》顯微膠卷，紀錄了這時期珍貴的報章史料。澳門中央圖書館也保存澳門獨有的《復興日報》的顯微膠卷，該報出版於太平洋戰爭期間，出版葡英中三種文字的報紙，為在澳的葡人英人和華人提供各種政府允許發佈的消息，也成為現時研究澳門戰時歷史的史料。可是，這些顯微膠卷多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出版的報紙，在此之前的報紙也絕無僅有，消息在兩岸四地的圖書館中，成為澳門這時期歷史空白的原因之一。

葡人不保存中文報紙

澳葡管治下的澳門設有圖書館，可是葡人政府祇收藏葡文或英文報章，故此澳門歷史檔案館、澳門中央圖書館和民政總署圖書館藏有大量的葡文和英文報章，涵蓋抗戰時期的有：Jornal de Notícias、Macau Herald、Mocidade Que Passa、Maria Rita (Porto)、Macau Tribune、O Tio Tareco、Renascimento（葡文及英文版《復興日報》）、《The Clarion》、《União》和《A Voz de Macau》（《澳門聲報》，又譯《澳門之聲》）。這些外文報章均有報導中國戰事和葡人社區的消息，可是對華人社區的報導消息較少，但亦可作為研究戰時澳門歷史的文獻。

廣州和香港還未淪陷前，兩地的報章偶然會報導澳門的消息，祇是並不多見，因而難以了解眾多事件的脈絡。但也有一點好處，就是報導不用受制於澳葡政府的政策，報導可具有批判性，有助於全面瞭解個別事件。由於香港在淪陷前由有新聞管制，屢有開天窗的情況，但都不涉及澳門的消息。

由於澳門報章史料的消失，以報章為主作研究幾乎沒可能，祇有在大規模的徵集下，才有可能有所突破。

二、檔案史料

報章史料消失不全，檔案史料成為重構澳門抗戰時期最重要的文字史料。由於這一時期的檔案分佈在全球各地，研究戰時澳門的歷史，是一項費時艱鉅的工作，也須具備熟悉各種的文字研究人員。現在祇介紹澳門、香港、臺灣、大陸兩岸四地的情況，特別是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系統的文獻史料。

1) 澳門

澳門歷史檔案館位於澳門荷蘭園，與澳門中央圖書館相鄰。它保存着不同時期與澳門有關的本地和海外檔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二檔館”）在澳門回歸後將一批一萬多張與澳門或港澳有關的顯微膠卷送到該館，成為研究戰時澳門歷史的重要中文史料。當中包括國民黨港澳總支部的會議紀錄、中統有關澳門的情報、戰前戰後澳門社團的情況等等。祇是這些檔案無法說明所有事件，與民國時期的其他檔案一樣，必須在其它檔案館查找。

澳門歷史檔案館更大的特色是保存大量的葡文檔案，並夾帶中文、英文或法文等相關文件。從前該館設有電子搜索系統，對熟識英葡文的研究人員較有利。現在該館已採用網上搜索系統，在網上填好個人資料後，即完成登記手續，可經網上查找檔案。目前的網上搜索系統已大加改善，有中文介面，可供搜索的卷宗/彙集共十個，其中澳門基本法協進會的檔案是近期的，可輸入中文搜索。經濟局和教區檔案完全搜不到1937至

1945年的檔案，餘下七個宗卷/彙集均有若干這時期的檔案。其中民政廳的檔案最多，找到3405項目，依次如下教育廳182項、印務局73項、市政廳32項、土地工務運輸局和財政局各有6項、仁慈堂檔案亦有1項“仁慈堂財產、收入與支出登記簿冊”。

澳門歷史檔案館的新搜索系統，與原來的有同一問題——關鍵字不足，找不到重要人物的檔案，如戰時澳門總督戴思樂（Gabriel Maurício Teixeira）。筆者曾多次用不同方法，在電腦系統中輸入戴思樂葡文名的部分或全名，可是卻遍尋不獲。缺少關鍵字是很普遍的事，但戰時總督的姓名都沒有，反映三個可能：一是沒有加入這個關鍵字；二是有關的檔案都被拿走了；三是關鍵字已加入、檔案也沒被拿走，而是沒被公開。

筆者還曾作兩個嘗試，輸入戰時澳葡政府經濟局局長羅保（Pedro José Lobo）的葡文名，結果是找到戰前和戰後的紀錄，與他有關的戰時檔案很少，而且“經濟局檔案”中找不到任何抗戰時期的文件。另一嘗試是輸入岡恩教授（Geoffrey C. Gunn）在《澳門史1557 - 1999》（英文和葡文版的書都叫 *Encountering Macau*）已用過的檔案 AH/GGM，結果是找不到該系列的整批檔案。AH GGM 系列是有關總門總督府的檔案（Arquivo Histórico/Gabinete do Governo de Macau），岡恩教授是在澳門回歸前使用該批檔案的，到2007年筆者查詢時，館方已表示沒有這批檔案，相信檔案已被遷離澳門。

雖然如此，其他研究人員和筆者還是在澳門歷史檔案館找到有用而且重要的檔案，如暨南大學碩士李昆明在其畢業論文《抗日戰爭時期澳葡政府的“中立”政策研究》中使用該館的 AH/AC 檔案。筆者也無意中發現戰時華人民間組織向澳葡政府申請成立救濟難民組織的章程，這說明了澳門歷史檔案館還存有大量有用而未被查閱的檔案。相信再增加關鍵字後，特別加入中文關鍵字後，澳門歷史檔案館可發揮更大的功能，更多檔案可被使用，更易於重構戰時澳門的歷史。

2) 香港

香港歷史檔案館位於九龍觀塘，查檔手續很簡單，祇需要填寫個人資料，申領閱覽証可閱覽館藏檔案和書籍。

經用網上搜索系統查找，戰時澳門史料祇有“梁昌檔案”(Y. C. Liang Documents)一份，但這份資料卻暗藏英國可在戰後迅速重佔香港的原因。吳樹桑在“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會議”中發表的〈澳門在英國接收香港中的角色〉引用了部分檔案。此外，香港歷史檔案館亦藏有南京“二檔館”移交的有關香港和港澳的檔案，比對港澳兩地檔案館的文獻，對抗戰時國民黨系統在港澳的活動，可有較多的認識。

另外，英國戰時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有關香港在1842至1951年間的檔案 C.O.129，偶然亦有涉及澳門的史料。香港中央圖書館、香港歷史檔案館、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和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都藏有該批檔案，但各館之間所藏的年份或會有所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大學歷史檔案館藏有該校第五任校長賴廉士(Lindsay Tasman Ride)的個人檔案，目前該批檔案祇有在其女兒 Elizabeth Ride 在校時，才會接受申請使用。賴廉士個人檔案的特別之處，是包含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的文件。英軍服務團是香港淪陷後賴廉士逃到中國後方後，經中英兩國批准成立、隸屬於英國軍情九處(MI9)的地下組織，該團的活動包括香港、惠州、大鵬半島、曲江(韶關)、廣州、桂林、台山、梧州、昆明、澳門和東南亞等地區。未計及 Elizabeth Ride 多年來在各地找到的文件，全部二萬八千多頁，是研究太平洋戰爭期間華南抗戰的重要檔案。祇是該批檔案本身包含代名和代號，一般人較難閱讀。由於該團部份成員戰後成為香港政府和社會的著名人物，梁昌更成為港澳的知名人士，該批檔案有助於研究戰時和戰後香港和澳門的歷史。

3) 臺灣

臺灣應是擁有最多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系統檔

案最多的地方。目前所知，戰時檔案分別藏在三個以上的地方：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轄下黨史館(下稱“黨史館”)、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下稱“近史所”)、調查局檔案館等等。

“黨史館”是國民黨檔案存放的地方，查檔需透過傳統的卡片櫃查找。香港淪陷前國民黨設有港澳總支部，香港淪陷後改設澳門支部，因此該館應有在香港和澳門的紀錄。如未知檔號而欲查找這些檔案，必須在卡片中找到相關檔案，才可調出檔案查閱。在“黨史館”查閱檔案，無需臺灣當地學者或大學的介紹信，祇要原來學術機構文件即可。另外，“黨史館”不提供複印服務，所有檔案祇能用筆抄錄。

國史館和“近史所”都需要當地學術機構或學者的推薦信，才可入內查閱。國史館藏有政府部分的檔案，如蔣中正檔案中偶有提及香港和澳門的內容。另外，該館存有抗戰初期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與澳門各界救災會的通信，是研究各界救災會的重要史料。

“近史所”檔案館收藏有關外交部分的檔案，可是該所藏戰時國民政府與葡萄牙交往的檔案中，祇有一卷“葡萄牙澳門事件”(1938/9至1940/1)，這對研究來說也是一種幫助。亞太司下有澳門一項，但所收藏的都是勝利後特別是五六十年代的檔案，奇怪的是亞太司下竟沒有香港的檔案。“近史所”檔案館藏有朱家驊個人檔案、汪(精衛)政權經濟檔案等史料，對研究港澳戰時的歷史，都可能有助的作用。

“近史所”檔案館和國史館都設有關鍵字查檔系統，檔案可付費複印，但最多祇可及一宗卷的一半。調查局檔案館未開放，但應保存着軍統的檔案，是研究抗戰的重要史料，期望有日可開放使用。

4) 大陸

(1) 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

南京第二歷史檔案是研究民國史的重鎮，館藏豐富民國時期史料的檔案館。上文已談及“二

檔館”將有關香港和澳門的檔案顯微膠卷移送兩地檔案館，“二檔館”內還有沒有跟這兩地有關而未移送的檔案呢？“首屆澳門學國際會議”上就有學者指二檔館還有大批有關澳門教育等檔案，另外有書刊引用“二檔館”檔案說港澳的金融史實，這都是現兩地檔案館目前所未包含的部份。

“二檔館”的查檔手續較為嚴謹，需要學術單位提供介紹信。以前的做法是查檔前會根據用者的需要，給予相關檔案的目錄，用者在這些目錄中查找自己所需的檔案，據說現在可經電腦查閱。調檔及複印都要付費，複印檔案需經申請和審查，如不複印則可抄錄內容。

(2) 廣東省檔案館

澳門與廣東省相連，戰時與偽廣東省和廣州市政府有所交往，廣東省的檔案理應有不少與澳門有關者。祇是，勝利前後日偽曾燒燬文件，現存中還有多少與澳門相關的，也有探索的需要。

廣東省檔案館擁有小量與戰時澳門有關的檔案，也有戰後審判漢奸的檔案。臺灣學者吳淑鳳的〈伸張正義？—戰後引渡逃匿澳門漢奸（1945-1948）〉（《國史館學術集刊》第一期，臺北，民國九十年，129-160）就引用了該館的檔案，並闡釋部分戰時在澳門為日偽効勞的人的案件，亦涉及如黃公傑等人的司法檔案。瞭解這些檔案，有助於揭開日偽在澳門的所作所為。

三、書刊文獻

所有已出版刊行的文字史料，都是這一類。澳門中央圖書館和澳門大學兩個澳門資料室收藏大量與澳門有關的書刊文獻，包括多種戰後出版的中葡英等多種文字的書刊，任何人士都可入內使用，無須辦理手續。

澳門政府戰時出版的政府憲報（Boletim Oficial de Macau），都存放在澳門中央圖館和歷史檔案館，是研究澳門政府施政的重要資料。另外圖書館也有相當完整的各類澳門出版的期刊，



位於臺北市凱達格蘭大道上中國國民黨總部的黨史館

《澳門研究》和《文化雜誌》等都以中葡文刊有學者發表的各類論文，包括戰時的研究。

廣州市立中山文獻館是另一間藏有豐富的民國時期書刊的圖書館，與澳門有關的有1946年出版的《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八年來工作概況》，反映該院在戰時所作的醫療和慈善方面的貢獻，甚至了解難民在澳門的生活情況，可惜未能找到。不過，該館還有1947年出版的《鏡湖醫院概況1941-1946年》，還可以藉此一窺鏡湖醫院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的努力。

戰時曾在澳門生活過的人的記錄，可能刊印在過去數十年出版的書刊中，甚至以不同的文字出版，散佈在全球各地。這都需要有心人用時間去找尋，以便重構戰時澳門的史實。筆者曾在香港八所大學的圖書館中找到逾千本與澳門有關的書籍，當中或許祇有一句跟澳門相關的，卻為研究增加了一個線索和一絲希望。

抗戰時期澳門歷史研究中的問題

歷史是按時序發生的事情，研究歷史必須知道事件發生的時間，才可以排序，再進行比對和分析，找出事情的前因後果。

有關澳門的編年史，先後出版了兩套。第一套是1997年施白蒂編金國平等譯的《澳門編年史》，另一套是2010年出版、由吳志良、湯開建和金國平主編的《澳門編年史》。這兩套工具書為研究澳門的歷史提供了便利和線索，祇是這兩套書都無法說清眾多史實，這都是沒有足夠的史料所致。

另外，目前戰時澳門歷史還沒有完整和系統的研究，又成為未能深入研究的原因。未能完整研究，是目前還有眾可做而未做的工作，如大規模的口述歷史研究。黃啟臣在“首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已提出了開展綜合性研究，並主張結合內地、港澳臺和海外學者參與。



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黃教授的看法同樣可應用在抗戰時期的研究，特別是史料分散，一地的學者走訪多地，體力時間和資源都是負擔。未能系統研究，是因為澳門歷史檔案館和境外特別是葡萄牙方面的檔案還未充份蒐集和整理，這不但影響到戰時歷史的研究，還影響到“澳門學”的構建。王國強在〈建立澳門史料學來研究澳門歷史〉中也指出“不論中外的澳門史料，均缺乏有系統的工具書，如書目、索引、資料匯編，也造成研究的阻力”。可見前輩對這些問題已有所掌握和瞭解，希望藉着澳門學的建立和各方學者的努力，使有關戰時歷史的研究趨向成熟。

結語：史料蒐集和保存

“史學便是史料學”。不管研究哪一時期哪一地方的歷史，都要有盡可能多的史料，才可構建研究的體系，以及解釋歷史發展的因果。兩岸四地所藏有關澳門戰時的檔案，絕不止上面所談的幾處。找尋史料需要大量的時間和資源，這不是一個人所能負擔得來的工作。澳門基金會資助和出版了大量的文獻，期望該會可協助蒐集、翻譯和出版更多史料，減少學者四出找尋的工作。

事實上，口述歷史是可以進行的一項工作，收集本地和境外人士與澳門有關的經歷，進一步整理成冊，以便研究者參考運用。這是一項急迫的工作。行文至此，驚聞戰時在澳門警察廳工作、曾擔任警察廳與英軍服務團澳門辦事處之間聯絡和翻譯工作的彭彼得先生去逝。這使戰時澳門歷史的研究，又增添了困難。現在澳門還有不少經歷戰爭的老人健在，口述歷史是刻不容緩的事。

除了口述歷史這項非紙類史料要保存外，文物保存也是當務之急。近年澳門急速發展，眾多舊建築都被拆去重建。位於松山的前日本駐澳領事館就在這幾年被拆掉，目前澳門仍保存着日本人用作情報機關的大宅，是否可以用作澳門抗戰紀念館，則要看有心人是否在位了！

檔案史料是以政府收集的文件為主，但檔案一定未能涵蓋所有的事情。民間的回憶是歷史不可缺少的部分，檔案要找，民間的活歷史也要找，相輔相承才可重構戰時澳門的歷史，才可能解答一系列未解之謎。

【參考資料】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澳門專檔》，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1995。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大學、澳門理工學院編：《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中葡關係卷》，北京市：中華書局，2004。
- 王國強：〈建立澳門史料學來研究澳門歷史〉，《澳門研究》第2期。澳門，1994年9月。
- 杜維運撰：《史學方法論》，臺灣，華世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9月三版。
- 黃鴻釗編：《中葡澳門交涉史料》，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
- 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成都市：四川人民，1999。
- 吳志良、湯開建和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廣州市：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
- 吳淑鳳：〈伸張正義？—戰後引渡逃匿澳門漢奸(1945-1948)〉，《國史館學術集刊》第一期，臺北，民國九十年，頁129-160。
- 吳樹桑：〈澳門在英國接收香港中的角色〉，發表“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會議”，澳門，2010。
- 李昆明：《抗日戰爭時期澳葡政府的“中立”政策研究》，暨南大學碩士論文，未刊，2007。
- 房建昌：〈從日本駐澳門總領事館檔案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寇在澳門的活動〉，《廣東社會科學》1999年3期。
- 金國平、吳志良：〈抗戰時期澳門未淪陷之謎〉，載《澳門公共行政雜誌》，第51期。澳門：2001年3月，頁27-58。
- 施白蒂編、金國平譯，《澳門編年史》，澳門，澳門基金會，1997。
- 楊開荊：《澳門特色文獻資源研究》，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 黃曉峰、鄧思平、劉月蓮主編：《首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文化研究會，1995。
- 趙春晨：〈澳門歷史研究與新史料的刊佈和利用〉，《學術研究》，2003年第6期。
- 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編：《鏡湖醫院概況1941-1946年》，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民國36年。
- 杜維運撰：《史學方法論》，臺灣，華世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9月三版。
- 黃啟臣：〈澳門歷史研究芻議〉，《首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文化研究會，1995，頁175。